

非强制性税收征管会影响企业审计收费吗？

——来自纳税信用评级的证据

李世辉¹, 林 宁¹, 雷新途²

(1. 中南大学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2. 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采用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强制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评级为A企业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且连续三年及以上评级为A企业的审计收费下降更显著。机制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降低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审计收费。进一步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对审计收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事务所职业能力较低、法律环境差的情形下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创新税收征管方式,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非强制性税收征管; 纳税信用评级; 审计收费; 审计投入; 审计风险; 企业声誉; 代理成本

[中图分类号]F239; 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2)05-0023-10

一、引言

一直以来,如何制定合理的税收征管政策,约束企业偷税、漏税行为,稳定政府财政收支是我国政、学两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国现有征税体系以强制性税收征管为主,税务机关通过税务稽查对企业偷税漏税行为进行惩戒,并设置了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企业违法事实、处罚情况、违法当事人名称、代码等信息。然而,在现有较为完备的强制征税体系下,企业偷、漏、逃税现象依然有增无减。据《2018年中国税务稽查年鉴》统计,2017年全国各级税务稽查部门共立案检查和督导纳税人自查31.6万户,稽查查补收入1921.7亿元,查补入库收入1770.3亿元,全年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共计公布黑名单4228件,比2016年增长了218.85%。由此可见,由于企业抱有“不避税没好处,避税能获利”的心理,强制性税收征管的征税模式可能会受到部分企业的抵触,难以达到预期的征税效果。

现有研究发现,有效的税收治理可以抑制企业避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抑制盈余管理以及降低企业经营及违规风险^[1-4]。然而,尽管有很多文献证实了强制性税收征管的治理作用,但我国企业偷税漏税现象越来越严重的事实表明强制性税收征管可能仍存在局限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决策部署。2014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于当年10月开始实施。该办法目的在于增强企业诚信纳税意识,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现代财税体制。自此,学者们纷纷开始探讨纳税信用评级这一类新型的非强制性税收征管制度对企业的具体影响。例如,郭玲、李建军等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收遵从的积极作用^[5-6],孙雪娇等发现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声誉及融资约束的影响^[7]。

进一步,具体到审计收费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了如企业盈余管理状况、声誉、会计信息质量、内部委托代理问题等^[8-11],或者一系列外部治理因素,如法律环境、机构投资者等^[12-13],均会对审计收费造成影响。而纳税信用评级作为外部治理制度,其也可能通过改善企业避税问题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

[收稿日期]2022-05-09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JJ30882)

[作者简介]李世辉(1967—),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公司金融;林宁(1999—),男,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与公司治理;雷新途(1972—),男,浙江苍南人,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通讯作者,邮箱:leixintu@zjut.edu.cn。

代理问题,并进一步降低审计师所需投入的审计资源以及风险溢价。因此,本文以审计收费检验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治理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纳税信用评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1)本文从税收征管的视角实证检验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拓展有关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2)从事前激励视角检验纳税信用评级的治理作用,可以丰富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影响路径的研究;(3)本文检验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公司信息环境及经营风险的治理效应,可以为国家诚信和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纳税信用评级的“声誉效应”

有效契约假说认为,良好的声誉能够约束契约方机会主义动机,从而保障契约的签订和有效执行^[14]。外部审计师作为企业外部契约方,不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其主要通过管理层所提供的财务报表信息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判断企业经营风险。而财务报表中所包含的会计信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外部审计师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财务报表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识别,尤其是在对违规风险高的企业进行审计时^[15]。因此,外部审计师在一定程度上会根据企业声誉等外部综合信息来判断企业经营状况及违规风险,进而对预期需要承担的审计风险和付出的审计投入进行评估,并调整审计收费。

首先,纳税信用评级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综合考核企业当期及以往的纳税信用状况得出的结果。有严格的税务监管为A级纳税人背书,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公布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名单,不仅意味着评级为A的企业对外披露了更多高质量的信息,还向社会传递了这些企业诚信纳税的“好消息”。会计师事务所接收到关于企业的优良信号,对企业的信任将明显增加。因此,纳税信用评级所带来的声誉提高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议价能力,降低审计师对企业可能存在审计风险大小的评估,进而降低审计收费。

其次,高声誉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为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招致更多的媒体、分析师及社会公众的关注^[16]。媒体及分析师作为外部监管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减少管理层基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避税行为^[17]。同时,媒体和分析师可以对企业外部信息进行挖掘、甄别并重组,以获得企业最新经营状况的信息^[18],从而缓解企业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本文认为,高声誉所带来的外部监督效应缓解了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的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倒逼管理层减少自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而由于公司不同的风险类型都会影响企业的审计风险^[19],因此,经营风险的降低会使得审计师下调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级别,进而降低审计收费。

(二) 纳税信用评级的“治理效应”

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税收征管制度,在进行纳税信用评价时,税务机关会根据企业财务报表、账簿、反避税调查等信息对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管。此外,其包含的激励和惩戒机制能够有效抑制企业基于自利动机的避税行为,进而降低审计师所需承担的审计风险和付出的审计投入。具体而言,纳税信用评级通过以下几点影响审计收费:

首先,纳税信用评级可以激励企业合法合规纳税,对企业避税行为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多部门和单位在财政资金使用、项目审批、融资便利化等方面给予A级纳税人绿色通道和政策优惠。上述激励措施从提高企业现金持有、便利企业融资等方面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抑制了企业避税活动“节约现金”的动机。

其次,反避税调查是纳税信用评级的主要指标之一,国家税务总局会根据企业年度税务信息对企业进行纳税信用打分。对于评分较低的企业,国税局会将其列入重点监控对象,提高监督检查频次,并限制企业IPO、再融资、债券发行、进口关税配额分配等。上述严格的惩罚机制对避税行为起到了威慑作

用,加剧了企业避税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有效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可以提高 A 类纳税企业声誉、有效约束企业避税行为,从而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外部审计师将根据上述企业特征调整固有风险的评估水平和审计投入,进而降低审计收费。本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会降低企业审计收费。

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制度规定:连续三年及以上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纳税人(简称“三连 A”),还可以享受由税务机关额外提供的专门人员或绿色通道帮助办理涉税事项。此外,部分地方税务局还会举办纳税信用“三连 A”企业证书颁发仪式,为“三连 A”企业颁发荣誉证书和绿色通道服务卡。因此,连续三年评级为 A 体现了税务机关对企业诚信经营、依法纳税工作的高度肯定。

现有研究表明,长时间保持或连续进行某种行为会使得该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例如,当连续因违规被处罚对企业声誉的损害远大于只被处罚一次的情况^[14]。因此,纳税信用评级对审计师的影响会随着连续被评为 A 的次数的增大而不断增加,且由于“三连 A”会被政府予以特殊奖励,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边际效益会在连续评级为 A 的第三年达到顶峰。因此,相较于第一次和连续两年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企业,“三连 A”会为企业带了更大的声誉效应,对企业低避税、高信息质量、低风险起到更好的鉴定作用。此外,根据霍桑效应,当企业被评为 A 后,其会受到更多的外部关注。随着外部关注的增加,企业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因此,“三连 A”企业进行财务操纵、过度盈余管理等行为的概率更低。故而,相较于非“三连 A”的企业,审计师对“三连 A”企业的治理水平有着更多的信心,其会对“三连 A”企业收取更低的风险溢价,企业的审计费用进一步降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相较于第一年和连续两年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企业,“三连 A”企业审计收费更低。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4—2019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金融行业样本、ST、*ST、样本期间退市的企业样本以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15149 个样本观测值。此外,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 1% 分位的缩尾处理。本文使用爬虫技术从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获取样本期间上市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使用的其他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均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解释变量。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并于每年 4 月披露上一年的评级结果。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仅公布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企业名单。本文使用 *Grade* 表示纳税信用评级结果,如果当年评级为 A,则 *Grade* 为 1,否则为 0。使用 *Continue* 表示是否连续三年评级为 A,若企业连续 3 年及以上评级为 A,则在第 3 年或第 3 + *n* 年 *Continue* 为 1,否则为 0。若企业连续 1 或 2 年评级为 A,则当年 *Discontinue* 为 1,否则为 0。

2. 被解释变量。本文主要研究非强制性税收征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由于当年纳税信用评级在下一年 4 月披露,因此本文使用企业下一年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 *Lnfee*。同时,为了避免企业规模对审计收费造成的差异化影响,本文还根据企业规模对审计收费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该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将在稳健性检验中展示。

3. 控制变量。借鉴 Reid 等关于审计收费的研究^[20],本文控制了资产报酬率(*Roa*)、应收账款比(*Rec*)、企业上市年数(*Age*)、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托宾 Q(*TobinQ*)、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oe*)、是否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是否由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Top10*)、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Oponion*),且所有控制变量与审计收费同期。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审计收费	<i>Lnfee</i>	下一年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
	标准化的审计收费	<i>Lnfee1</i>	(下一年度审计收费 × 1000) / 期末总资产
解释变量	纳税信用评级	<i>Grade</i>	若当年样本企业纳税信用评级被评为 A, 则 <i>Grade</i>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连续 3 年评级为 A	<i>Continue</i>	若企业连续 3 年及以上评级为 A, 则在第 3 年或第 3 + <i>n</i> 年 <i>Continue</i> = 1, 否则取值为 0
	连续一或二年评级为 A	<i>Discontinue</i>	若企业连续 1 年或 2 年评级为 A, 则当年 <i>Continue</i> = 1, 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资产报酬率	<i>Roa</i>	净利润 / 期末总资产
	应收账款比	<i>Rec</i>	应收账款净额 / 期末总资产
	企业上市年数	<i>Age</i>	企业上市年数
	企业成长性	<i>Growth</i>	(当年营业总收入 - 上一年度营业总收入) / 上一年度营业总收入
	企业规模	<i>Size</i>	Ln(期末总资产)
	财务杠杆	<i>Lev</i>	期末负债总额 / 期末资产总额
	托宾 Q	<i>TobinQ</i>	期末市值 / 期末总资产
	两职合一	<i>Dual</i>	董事长与总经理若为同一人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产权性质	<i>Soe</i>	国有企业为 1, 非国有企业为 0
	是否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i>Big4</i>	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 1, 否则为 0
	是否由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i>Top10</i>	由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 1, 否则为 0
	审计意见	<i>Opinion</i>	若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则为 1, 否则为 0
	行业虚拟变量	<i>Industry</i>	证监会 2012 年划分的二级行业分类
	年份虚拟变量	<i>Year</i>	年份虚拟变量
	其他变量	本年度审计收费	<i>Auditfee</i>
会计 - 税收差异		<i>BTD</i>	(当年利润总额 - 当年所得税费用 / 年末名义所得税) / 期初总资产 $BTD = \alpha 1 \times TACC + \mu_i + \varepsilon_{i,t}$
扣除应计利润之后的会计 - 税收差异		<i>DDBTD</i>	其中应计利润 (<i>TACC</i>) = (净利润 -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资产总额 $DDBTD = \mu_i + \varepsilon_{i,t}$
企业声誉		<i>Rep1</i> <i>Rep2</i>	若被中国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等机构或部门通报并处罚, 则 <i>Rep1</i> 为 1, 否则为 0 Ln(被中国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等机构或部门通报并处罚的次数加 1)
第一类代理成本		<i>Ac1</i>	期末管理费用 / 期末主营业务收入
第二类代理成本		<i>Ac2</i>	其他应收款余额 / 期末总资产
市场竞争程度		<i>HHI</i>	行业 <i>HHI</i> 大于各行业竞争程度的平均数, 则 <i>HHI</i> = 0, 否则为 1
事务所行业专长		<i>Expert</i>	事务所 <i>i</i> 在行业 <i>k</i> 中所审计上市企业总资产平方根之和 / 所审计的所有上市企业总资产平方根之和
法律环境指数		<i>Law</i>	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

(三)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 本文构建了如下 OLS 回归模型:

$$Lnfee = \beta_0 + \beta_1 Grade + \beta_2 Roa + \beta_3 Rec + \beta_4 Age + \beta_5 Growth + \beta_6 Size + \beta_7 Lev + \beta_8 TobinQ + \beta_9 Dual + \beta_{10} Soe + \beta_{11} Big4 + \beta_{12} Top10 + \beta_{13} Opinion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1)$$

$$Lnfee = \beta_0 + \beta_1 Continue + \beta_2 Discontinue + \beta_3 Roa + \beta_4 Rec + \beta_5 Age + \beta_6 Growth + \beta_7 Size + \beta_8 Lev + \beta_9 TobinQ + \beta_{10} Dual + \beta_{11} Soe + \beta_{12} Big4 + \beta_{13} Top10 + \beta_{14} Opinion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sum Industry$ 和 $\sum year$ 为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模型的随机干扰项。其他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此外, 为排除异方差和个体相关性对估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本文对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 上市企业平均审计费用 (*Lnfee*) 为 13.953, 最大

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6.349 和 12.766,与现有文献关于审计收费的描述性统计基本一致^[21]。此外,在样本中 *Grade* 的均值为 0.662,说明有 66.2% 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 A,我国大部分企业纳税信用较好。此外,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未发现异常。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N	Mean	Std. Dev.	min	p25	Median	p75	max
<i>Lnfee</i>	15149	13.953	0.674	12.766	13.459	13.826	14.286	16.349
<i>Grade</i>	15149	0.662	0.473	0	0	1	1	1
<i>Continue</i>	15149	0.261	0.439	0	0	0	1	1
<i>Discontinue</i>	15149	0.401	0.490	0	0	0	1	1
<i>Roa</i>	15149	0.036	0.061	-0.270	0.014	0.035	0.063	0.191
<i>Rec</i>	15149	0.125	0.105	0.001	0.040	0.104	0.183	0.476
<i>Age</i>	15149	11.272	7.335	1	5	9	18	27
<i>Growth</i>	15149	0.161	0.401	-0.558	-0.031	0.095	0.254	2.473
<i>Size</i>	15149	22.433	1.282	20.154	21.515	22.251	23.155	26.373
<i>Lev</i>	15149	0.425	0.193	0.067	0.273	0.419	0.569	0.860
<i>TobinQ</i>	15149	2.644	1.819	0.859	1.409	2.076	3.204	10.551
<i>Dual</i>	15149	0.300	0.489	0	0	0	1	1
<i>Soe</i>	15149	0.350	0.477	0	0	0	1	1
<i>Big4</i>	15149	0.062	0.240	0	0	0	0	1
<i>Top10</i>	15149	0.596	0.491	0	0	1	1	1
<i>Opinion</i>	15149	0.023	0.150	0	0	0	0	1

(二) 基本回归结果

表 3 中报告了纳税信用评级与审计收费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2)分别列示了假设 1 和假设 2 的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Grade* 变量系数为负,且在 1% 水平上显著(-0.031, t = -3.12)。这说明当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审计师接收到了 A 类信用评级所带来的企业低代理成本及企业经营风险的信息,其向企业收取的风险溢价会降低,从而评级为 A 的企业的审计收费显著降低。列(2)显示,当企业连续三年评级为 A,企业在某一年或连续两年评级为 A 时,审计收费均显著降低。但 *Continue* 和 *Discontinue* 系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 *Continue* 和 *Discontinue* 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F = 17.02, P < 0.01),即连续三年评级为 A 对审计收费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除上述的实证分析外,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篇幅限制,此处不再列示具体结果,备索。

1. Placebo 检验

根据现有研究^[7,22],本文将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结果随机分配给样本内上市企业,并将新生成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按模型(1)重复回归 1000 次。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系数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的占比较小,意味着本文构造的虚拟处理效应并不存在,因此企业审计收费的降低是因为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披露所致,而不是其他偶然因素所致。

2. 倾向得分匹配回归

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本文以 *Grade* = 1 的样本为实验组,*Grade* = 0 的样本为控制组,并参考朱荣和李霞的研究^[23],选取 *ROA*、*Rec*、*Growth*、*Size*、*Lev*、*TobinQ*、*Soe*、*Big4* 作为协变量对

表 3 非强制性税收征管与审计收费

	(1) <i>Lnfee</i>	(2) <i>Lnfee</i>
<i>Grade</i>	-0.031*** (-3.12)	
<i>Continue</i>		-0.060*** (-4.07)
<i>Discontinue</i>		-0.014* (-1.67)
<i>Control</i>	YES	YES
<i>Constant</i>	5.016*** (24.97)	4.957*** (24.60)
<i>Year Effect</i>	YES	YES
<i>Industry Effect</i>	YES	YES
<i>Continue</i> 与 <i>Discontinue</i> 的系数差异检验		
F		17.02***
N	15149	15149
adj-R ²	0.667	0.667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t 值,下同。

样本进行1:1近邻匹配,并使用匹配得到的新样本进行回归。

在匹配之前,*ROA*、*Rec*、*Growth*、*Size*、*Lev*、*TobinQ*、*Soe*、*Big4*均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匹配之后,实验组与控制组公司的各协变量的均值差异均不显著,匹配效果较好。

在使用PSM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后发现,*Grade*和*Continue*的系数显著为负,*Discontinue*系数不显著,且*Continue*和*Discontinue*系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Continue*和*Discontinue*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F = 3.10, P = 0.078$)。上述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假设1和假设2结果的稳健性。

为了排除纳税信用评级与审计收费间的内生关系,进一步证明非强制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假设1进行检验。由于纳税信用评级一年一评,为了检验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次外生冲击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参考孙红莉等的研究^[24],选取2009—2016年样本,并剔除了所有2016年披露的评级为A的样本。此外,本文构建了分组虚拟变量*Post*和时间虚拟变量*Treat*,当目标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在《纳税信用管理办法》实施后被评为A时,则*Treat*取值为1,视为实验组,否则为0,视为对照组。*Post*表示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时间,评级结果披露后*Post*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系数显著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0.052, t = -2.71$)。从经济显著性上看,*Treat*×*Post*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审计收费降低1.87%。^①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审计收费的降低是因为纳税信用评级为A所导致的。

3. 排除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

为检验A类纳税信用评级是否意味着较低的避税程度,本文借鉴Desai等以及叶康涛等^[25,4]的研究,使用*BTD*与*DDBTD*作为企业避税程度的代理变量,对*Grade* = 0和*Grade* = 1样本的避税程度进行均值差异检验。在进行均值差异检验结果后发现,*Grade* = 1样本的*BTD*与*DDBTD*均显著小于*Grade* = 0的样本,说明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确意味着企业避税程度较低。

进一步,国税局仅向外界披露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名单,相较于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实验组企业而言,控制组企业并没有受到被国税局披露名单所带来的好的外部冲击。因此,为明确审计收费的降低是否来自于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披露,本文将控制组中避税程度低的企业与实验组中评级为A的企业进行类比,将控制组中避税程度高的企业与原控制组企业进行类比,进而构造*Grade1*与*Grade2*两个企业避税程度的代理变量。若控制组中企业的*BTD*(*DDBTD*)小于实验组企业*BTD*(*DDBTD*)的平均值,则将*Grade1*(*Grade2*)赋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显示,*Grade1*、*Grade2*与审计收费均负相关,但不显著。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假设1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检验

1. 声誉机制

纳税信用评级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综合考核企业当期及以往的纳税信息和信用状况等情况后得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严谨性。因此,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名单,向社会传递了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诚信纳税的“好消息”,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的声誉得到明显提高。而声誉作为长久以来社会各界对企业过去行为的综合评价,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审计收费。第一,良好的声誉增加了企业的曝光度,媒体、分析师、相关监督部门和社会公众会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声誉好的企业。这为企业带来了更强的外部监管压力,缓解了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了事务所的审计风险^[26]。第二,良好的声誉塑造了企业优质的外部形象,向利益相关方传递企业高会计信息质量等多个层面的优良信号,增加了企业的议价能力。因此,本文认为,纳税信用评级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以发

^①经济显著性 = $-0.052 * 0.3601651 / 13.70001 \approx 0.01873$ 。

挥“监督效应”和传递“好消息”两条路径来降低审计收费。为检验以上机理,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7],选取分别构建 *Rep1* 和 *Rep2* 两种方式衡量企业声誉。上述指标均为负向指标,数值越大,企业声誉越差。由表4可知,*Rep1*、*Rep2* 与 *Grade* 的相关系数均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0.037, t = -3.09$; $-0.425, t = -4.91$)。该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降低审计收费。

2. 代理问题

在新兴市场国家,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高股权集中度和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特征^[27],该结构导致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寻租行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28]。而避税行为扭曲了企业财务报告,严重损害企业内部信息质量,加剧了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避税活动和信息不对称会形成恶性循环,避税越激进、避税手段越复杂,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29]。而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种非强制性

税收征管制度,其可能通过事前的激励机制与事后的惩罚机制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缓解两类代理冲突^[30]。因此,本文认为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可以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错报风险,审计师对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所收取的风险溢价降低,企业审计收费下降。

参考已有研究^[31],本文分别以 *Ac1* 和 *Ac2* 代表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由表4可知,*Ac1*、*Ac2* 与 *Grade* 的相关系数均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能够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来降低审计收费。

(二) 异质性分析

1. 产权性质

在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治理机制和资源禀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32]。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首当其冲肩负着帮助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重任,国有企业进行避税行为需要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因此,国有企业的避税动机小于非国有企业。其次,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策福利和资金支持,其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投入和科研创新,维持市场竞争力,这也抑制了国有企业基于获取充足现金流的避税动机。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其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更大,同时也缺少政府资源支持^[33],其更有动机去进行避税等一系列高风险行为,获取更多的现金流以支持公司发展。因此,非国有企业避税动机更大,事务所会更关注非国有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等由政府部门背书的信息^①。

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国有企业组,*Grade* 系数为负数,但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组,*Grade* 系数为负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0.036, t = -3.18$)。这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审计师会更在意非国有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所传递的企业高质量、纳税规范等信息,纳税信用评级为A在降低非国有企业审计收费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②。

2. 市场竞争环境

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企业业绩与行业最优业绩的差距会促使企业调整

表4 机制检验

	(1)	(2)	(3)	(4)
	<i>Rep1</i>	<i>Rep2</i>	<i>Ac1</i>	<i>Ac2</i>
<i>Grade</i>	-0.037 *** (-3.09)	-0.246 *** (-4.91)	-0.004 *** (-3.00)	-0.001 * (-1.96)
<i>Control</i>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1.237 *** (5.69)	3.613 *** (3.88)	0.277 *** (11.61)	-0.021 (-1.56)
<i>Year Effect</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 Effect</i>	YES	YES	YES	YES
N	15149	15149	15149	15149
adj-R ²	0.160	0.185	0.392	0.179

①本文检验了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分布情况,发现2014至2019年间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国有企业样本占有所有国有企业样本的63.8%,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非国有企业样本占有所有非国有企业样本的67.5%,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即是否为国有企业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纳税信用评级结果。

②此外,我们还使用国有企业股权占比的平均数和中位数进行了额外的分组检验,结果也均表明在国有持股比例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对审计收费的抑制作用更强。

经营政策,改善经营结构。若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激烈,企业想要保持竞争力,就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流和外部融资来进行研发投入和产品创新。而避税行为可以给企业节约部分税负,进而为研发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审计师对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进行审计需要付出更多的审计投入来分析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避税等提高审计风险的违规行为,并调整审计费用。但由于纳税评级为 A 为企业避税程度较低的事实提供了鉴证,审计师会减少对企业避税行为导致的经营风险的担忧,进而减少审计收费。

表 5 产权性质、市场竞争环境、事务所能力、法律环境与审计收费

	<i>Lnfee</i>							
	(1)	(2)	(3)	(4)	(5)	(6)	(7)	(8)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市场竞争程度	低市场竞争程度	高事务所行业专长	低事务所行业专长	法律环境好	法律环境差
<i>Grade</i>	-0.021 (-1.16)	-0.036 *** (-3.18)	-0.033 *** (-2.86)	-0.025 (-1.28)	-0.020 (-1.33)	-0.036 *** (-2.85)	-0.016 (-1.32)	-0.038 ** (-2.42)
<i>Control</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4.094 *** (11.15)	5.508 *** (23.07)	4.049 *** (10.76)	5.622 *** (25.12)	4.537 *** (16.32)	5.455 *** (21.38)	4.761 *** (20.53)	5.298 *** (18.02)
<i>Year 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 Effect</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5305	9844	4677	10472	6663	8486	8349	6800
<i>adj-R²</i>	0.705	0.621	0.704	0.636	0.691	0.652	0.707	0.653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衡量行业竞争激烈程度。本文以年度内各行业竞争程度的平均数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表 5 回归结果显示,在高市场竞争组,*Grade*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0.033, $t = -2.86$),而在低市场竞争组,*Grade* 系数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避税动机更强,企业违规风险更高,此时纳税信用评级为 A 对减轻外部审计师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发挥的作用更大。

3. 事务所职业能力

事务所职业能力决定了其在进行审计工作时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发现财务舞弊的能力。现有研究表明^[34],具有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可以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审计经验来提高审计效率,发现企业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能力更强,其对纳税信用评级提供的公司信息质量及避税的信息的依赖性更低。而对不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其可能需要借助于纳税信用评级为 A 所提供的企业信息质量的优良信号来进行审计定价。为检验上述逻辑,本文参考李辰等的方法^[34],以行业组合法计算得出的数据大小代表事务所行业专长(*Expert*),并采用 *Expert* 的平均数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表 5 回归结果显示,在低事务所行业专长组,*Grade*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0.036, $t = -2.85$),而在高事务所行业专长组,*Grade* 系数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能力较差的事务所可能更依赖于纳税信用评级等企业外部制度提供的企业信息质量及经营风险的信息,纳税信用评级为 A 对被能力较弱的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审计收费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4. 法律环境

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式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各地区法律水平不一致,存在执法水平某些地区高、某些地区低的现象。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执法力度更强,诉讼风险更高,审计师对于企业风险的评估更加严格,其需要综合影响审计收费的各方面因素,最后得出最严谨的结果。而在法律环境差的地区,企业和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较低,较低的诉讼风险使得事务所对于企业整体风险的评定更加宽松。因此,如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等可以反映企业高信息质量、低违规风险的由国家机关背书的外部因素会大大增强审计师对于企业低经营风险的信心。审计师会下调对企业审计风险的评估,进而降低审计收费。

本文以樊纲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的平均数为标准^[35]区分法律环境的优劣

并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的列(7)、列(8)所示,在法律环境差的组,Grade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0.038, $t = -2.42$),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Grade系数不显著。

六、结论性述评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刻画非强制性税收征管,研究非强制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可能在降低企业的审计收费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本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审计收费显著降低,且连续三年及以上评级为A的企业审计收费下降更明显。机制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和降低代理成本两个方面影响审计师对审计投入和风险溢价的评估,进而导致企业审计收费的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企业避税程度低于评级不为A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的评级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纳税信用评级为A对企业审计收费的降低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事务所职业能力较低以及法律环境较差时更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了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应创新对企业的治理方式。非强制性税收征管通过事前激励的方式鼓励企业自主纳税,在一定程度上与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互补作用。未来,政府可以多尝试使用激励型监管政策,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企业主动服从制度规定。第二,国家应更加关注税收征管制度的治理效应。政府税收治理不仅在抑制企业避税上发挥作用,其还在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在制定税收征管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其如何在抑制避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到优化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全过程中发挥治理效应。第三,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信用文化建设。企业积极配合纳税信用评级给企业带来的声誉效应和政策激励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因此,企业应积极参与社会信用文化建设,实现企业和政府的双赢。

参考文献:

- [1] 樊勇,李昊楠. 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对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评估[J]. 财贸经济,2020(5):51-66.
- [2] 于文超,殷华,梁平汉. 税收征管、财政压力与企业融资约束[J]. 中国工业经济,2018(1):100-118.
- [3] 刘行,赵健宇,叶康涛. 企业避税、债务融资与债务融资来源——基于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断点回归分析[J]. 管理世界,2017(10):113-129.
- [4] 叶康涛,刘行. 税收征管、所得税成本与盈余管理[J]. 管理世界,2011(5):140-148.
- [5] 郭玲. 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1):86-97.
- [6] 李建军,范源源. 光环之下:纳税声誉能否提升企业税收遵从[J]. 当代财经,2020(8):28-40.
- [7] 孙雪娇,翟淑萍,于苏. 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19(3):81-99.
- [8] 陈冬,罗祎. 公司避税影响审计定价吗? [J]. 经济管理,2015(3):98-109.
- [9] Francis J R, Krishnan J. Accounting accruals and auditor reporting conservatism[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9,16(1):135-165.
- [10] 杜勇,何硕颖,陈建英. 企业金融化影响审计定价吗[J]. 审计研究,2019(4):101-110.
- [11] 权小锋,陆正飞. 投资者关系管理影响审计师决策吗? ——基于A股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综合调查[J]. 会计研究,2016(2):73-80.
- [12] 王良成,陈汉文. 法律环境、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J]. 财贸经济,2010(4):69-75.
- [13] 叶陈刚,武剑锋,谈兆迪. 公司治理结构、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2015(5):18-25.
- [14] 刘笑霞,李明辉,杨鑫. 签字会计师个人经验与财务重述[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6):52-64.
- [15] 吕敏康,冉明东. 媒体报道影响审计师专业判断吗? ——基于盈余管理风险判断视角的实证分析[J]. 审计研究,2012(6):

82 - 89.

- [16] Allen A, Francis B B, Wu Q, et al. Analyst coverage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6, 73 (12): 84 - 98.
- [17] Dai L, Parwada J T, Zhang B.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media's news dissemination role: Evidence from Insider trad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5, 53 (2): 331 - 366.
- [18] 郑建明, 孙诗璐. 税收征管与审计费用——来自“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1 (4): 43 - 52.
- [19] Kim J, Li Y, Zhang L.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irm-year level analysi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0 (3): 639 - 662.
- [20] Reid L C, Carcello J V, Li C, et al. Impact of auditor report change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audit cost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9, 36 (3): 1501 - 1539.
- [21] 熊毅, 洪荭. 投资者情绪与审计收费——基于审计师执业风险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1 (3): 43 - 55.
- [22] Zhai H Y, Lu M T, Shan Y W, et al. Key audit matters and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1 (75): 101747
- [23] 朱荣, 李霞.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 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的双重检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 (4): 38 - 46.
- [24] 孙红莉, 雷根强.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J]. *财政研究*, 2019 (12): 87 - 101.
- [25] Desai M A, 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 (1): 145 - 179.
- [26] 李哲, 黄静, 孙健. 企业创新新颖度与审计收费——基于上市公司专利分类数据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20 (8): 178 - 192.
- [27] 刘运国, 吴小云.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J]. *管理学报*, 2009 (12): 1661 - 1669.
- [28]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26 (2): 301 - 325.
- [29] 廖歆欣, 刘运国. 企业避税、信息不对称与管理层在职消费[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2): 87 - 99.
- [30] 曾亚敏, 张俊生. 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 [J]. *管理世界*, 2009 (3): 143 - 151.
- [31] 严若森, 叶云龙. 证券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 2017 (10): 173 - 183.
- [32] 杨洋, 魏江, 罗来军. 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 ——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 2015 (1): 75 - 86.
- [33] 胡海峰, 窦斌, 王爱萍. 企业金融化与生产效率[J]. *世界经济*, 2020 (1): 70 - 96.
- [34] 李辰, 刘巍, 游家兴. 高管薪酬激励的团队协同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21 (3): 72 - 83.
- [35]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 (9): 4 - 16.

[责任编辑:黄燕]

Do Non-compulsory Tax Enforcement Affect Corporate Audit Fees?

——Evidence From Tax-paying Credit Ratings

LI Shihui¹, LIN Ning¹, LEI Xintu²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4 to 2019, we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of non-compulsory tax enforcement on corporate audit fe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udit fees of companies with A rating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the disclosure of tax-paying credit ratings. Furthermore, the decrease of audit fees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companies with A ratings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and above. The mechanism study suggests that tax-paying credit ratings can reduce corporate audit fees by improv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reducing agency costs. Further, we find that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inhibition on audit fe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situations with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poor legal environment and low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e result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novate tax collection and promote “social integr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on-compulsory tax enforcement; tax-paying credit rating; audit fee; audit input; audit risk; enterprise reputation; agency cost